

《乐府群玉》成书、增订时间及影响考论

葛云波

《类聚名贤乐府群玉》(下文简称《乐府群玉》)是现存元人编辑的四种散曲总集之一,是元散曲研究的重要文献。对其成书时间的确定,以及对其影响的考察,将有益于研究者关于元散曲创作的历史性想象,有利于呈现元散曲创作的部分历史原貌,从而便于学者对元散曲做出更为细致的研究。

一

《乐府群玉》今有郑振铎藏心井鑫抄本、吴梅校本、任讷校本、隋树森校订本等,皆源于天一阁旧藏蓝格影元抄本,俱无序跋等可以直接帮助断定其成书时间的信息。任讷校本《乐府群玉》于附录二《录馀琐志》云:“《群玉》虽不必为最先,要必不为最后;其在《太平乐府》之前,似无疑议。因所登小山之作,悉在《今乐府》一集中,未尝参入他集一首也……若《太平乐府》则仅无《外集》之作,至于小山馀四集内篇章,固无不具备也。”^①认为《乐府群玉》在《太平乐府》之前,独有卓见。然或因其论述仅此数语,未考证出该书较具体的成书时间,虽有《散曲丛刊》之巨大影响,亦未足令学界信服,不见响应者。其好友卢前作于“乙亥(1935)二月”的《梨园按试乐府新声》跋讲到元代散曲选集,即按这样的顺序排列:“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、《乐府新编阳春白雪》……《乐府群珠》、《乐府群玉》、《自然集》、《梨园按试乐府新声》”^②。隋树森编成于1964年的《全元散曲》于作品后列举所依版本,若元人编辑的四种散曲总集均用到,则作“《阳春白雪》、《太平乐府》、《乐府群玉》、《乐府新声》”的顺序^③;隋树森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《现存元人所编四种散曲选本提要》讲解的顺序是“《阳春白雪》、《太平乐府》、《乐府新声》、《乐府群玉》”^④。1998年

① 任讷校本《乐府群玉》最末有跋,“(民国)十二年(1923)”云云,故知《录馀琐志》亦当作于其时。任讷:《散曲丛刊》第二种,中华书局,1931年。

② 卢前校本《梨园按试乐府新声》,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。

③ 隋树森:《全元散曲》,中华书局,1964年初版,1989年第三版。

④ 隋树森:《元人散曲论丛》,齐鲁书社,1986年。

出版的《历代散曲汇纂》中按《阳春白雪》、《太平乐府》、《乐府新声》、《乐府群玉》的顺序编排^①。盖均以为《乐府群玉》在《太平乐府》之后或更晚。由是知《乐府群玉》成书时间不可不详加考辨。

钟嗣成《录鬼簿》卷下“胡正臣”条附胡存善小传，云：

存善能继其志。小山乐府、仁卿《金缕新声》、瑞卿《诗酒馀音》，至于《群玉》、《丛珠》哀集诸公所作，编次有伦，及将古本□□，直取潭州易氏印行，元文□读无讹，尽于书坊刊行。亦士林之翹楚也。^②

知《录鬼簿》已著录胡存善（1280？—1351后？）所编《乐府群玉》^③，则《乐府群玉》必编在《录鬼簿》修订之前。按，《录鬼簿》修订于至正五年二月到至正六年七月之间^④，则《乐府群玉》必编于至正六年（1346）七月之前。

为考察《乐府群玉》成书时间的上限，先引两段文字。《乐府群玉》卷二“乔梦符乐府”第一首为乔吉〔绿么遍〕《自述》曲云：

不占龙头选，不入名贤传。时时酒圣，处处诗禅。烟霞状元，江湖醉仙。

笑谈便是编修院。留连，批风切月四十年。

《录鬼簿》“乔吉甫”条：

江湖间四十年，欲刊所作，竟无成事者。至正五年二月，病卒于家。

并附吊词云：

平生湖海少知音，几曲宫商大用心，百年光景还争甚？^⑤

《录鬼簿》所谓“江湖间四十年，欲刊所作，竟无成事者。至正五年二月，病卒于家”盖棺论定之语，恰好与〔绿么遍〕《自述》曲末句相吻合。那么，此曲当为乔吉去世（至正五年〔1345〕二月）前不久所作。“江湖间四十年，欲刊所作，竟无成事者”，“少知音”云云，盖谓其生前无人为之刊行作品；这当包含了《乐府群玉》能第一次大量收录其小令，公布于世，亦为乔吉身后之事的意思。因此，推测《乐府群玉》的编定在至正五年（1345）二月之后为近是。

考察《乐府群玉》的编排，可知选编者具有良苦的用心，比如：（一）它区别于一般选本以曲牌为单位或以内容来分类的单向度编辑方法，而首先以曲家为单位来安排全书先后次序，然后各曲家之下再以曲牌来编排。（二）它将带含有创作思想的“引”的作品置于全书之首，“含蓄”地表达自己编辑散曲的思想，为全书定下追求清新韵美的基调，与具有清丽天然风格的全书作品相

① 《历代散曲汇纂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。

② （元）钟嗣成等：《录鬼簿》（外四种），古典文学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86—87页。

③ 《乐府群玉》的选编情况，详见拙作《〈乐府群玉〉选编者胡存善臆考》，未刊稿。

④ 王钢：《校订录鬼簿三种》“钟嗣成年谱”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；拙作《〈录鬼簿〉修订过程、时间及版本新考》，《南京师大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6年第4期。

⑤ （元）钟嗣成等：《录鬼簿》（外四种），第85页。

呼应。(三)它仅选小令,未像其他散曲选本一样兼选套数(套数相较小令文饰不足,俚俗成分多一些^①),这种选法便进一步加强了选编的倾向性,突出了其审美取向。那么它置乔吉自我总结的〔绿幺遍〕《自述》曲于“乔梦符乐府”之首,便不是随意的。在这里,这首“自述”文字的安排,似不再仅是曲家的自我总结,而变成了选编者对曲家的一种认识,一种肯定,一个总结,并要将此形象首推予读者;它本是曲家的自我凭吊,而在这里,它更像选编者的追悼,如同《录鬼簿》里的吊词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《乐府群玉》编定于乔吉去世之后,以悯斯人之憔悴,也就可以想见。

综上所述,《乐府群玉》当成书于至正五年(1345)二月之后,至正六年(1346)七月之前。《太平乐府》前有邓子晋撰于至正辛卯(1351)春的序,所以它当成书于其时,要晚《乐府群玉》四年有馀。

《乐府群玉》存在增订的情况,天一阁旧藏蓝格影元抄本及其后的各种校本,源于增订前较早的版本;增订本早佚,《乐府群珠》保存了增订本的部分面貌(包括不同于较早版本的格局和曲家小令)^②。以上所考《乐府群玉》成书时间即就今存较早的版本而言,其增订本当晚于此。

邓子晋为《太平乐府》作的序,自然也表明了编者杨朝英的思想。序云:“新选《太平乐府》一编,分宫类调,皆当代朝野名笔,而不复出诸编之所载者”^③。比较《乐府群玉》较早版本与《太平乐府》,发现后者不载前者所选赵文宝、曹明善、陈德和、王日华、张子坚、丘士元等曲家;通过对前者与后者共同选及的曲家(后者有的仅选了套数)的统计比较,亦可以看出后者尽量避免前者所已选及的作品(详见下表),均体现了其“不复出诸编之所载者”的编辑思想。

《太平乐府》 《乐府群玉》均 选及的散曲家	曲家今存小令 总篇数(以《全 元散曲》为准)	《乐府群玉》收 录小令篇数	《太平乐府》收 录小令篇数	二书均选曲家 相同篇目数
乔吉	213	137	47	12
刘时中	73	51	10	1
马致远	100	1	28	0
钟嗣成	59	20	20	0
贯云石	70	3	30	0
吴弘道	34	7	8	0
张可久	800	154	302	7
任昱	59	59	0	0

① 参看李昌集:《中国古代散曲史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2年,第42页。

② 详见拙作《〈乐府群玉〉增订与残缺情况考辨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6年第3期。

③ 卢前校订本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,文学古籍刊行社,1955年。

李致远	26	26	0	0
周文质	43	43	0	0
郑光祖	6	2	0	0
王仲元	21	21	0	0

注:1.《太平乐府》选及任昱、李致远、周文质、郑光祖、王仲元,但仅选其套数。

2.本表据《类聚名贤乐府群玉》(郑振铎藏心井盒抄本)和卢前校订本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(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1月版)为准。

作为《乐府群玉》增补本补入的曲家,如:鲜于必仁,不见于《太平乐府》;作为《乐府群玉》增补本补入的小令,如卢挚52首,有50首不见于《太平乐府》^①。这些可以说均与后者的“不复出诸编之所载者”编辑思想相符合。因此,《乐府群玉》增补本亦当早于《太平乐府》,为后者所避免的“诸编”之一。也就是说,《乐府群玉》增订本成书不晚于至正辛卯(1351)春。

二

《乐府群玉》作为今存元人选编的散曲总集四种之一,所选的700多首小令“约有一半左右是其他元、明曲书中所没有的。所以这部书也保存着不少散曲史上的重要材料”^②。

除了保存文献的价值之外,更能体现其历史价值的是:《乐府群玉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《录鬼簿》卷下“胡正臣”条附胡存善小传称赞该书“编次有伦”,这相对于当时其他诸种选本未得《录鬼簿》的评价,甚至未得简单的著录(如:杨朝英《阳春白雪》、《太平乐府》),要幸运得多,同时说明它在当时影响不弱。更能说明它当时影响甚大的是:《乐府群玉》在多方面影响了数年之后杨朝英编成的《太平乐府》^③。

(一)《乐府群玉》的编辑思想影响了杨朝英编辑《太平乐府》。

刘时中的〔水仙操〕“湖山堂下闹竿儿”等四段,《阳春白雪》和《乐府群玉》均选到,然前者无“引”,后者有“引”,引有所谓西湖之作“每恨其不能佳

①《乐府群玉》的增订情况,详见拙作《〈乐府群玉〉增订与残缺情况考辨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6年第3期。

②隋树森校订:《类聚名贤乐府群玉·前言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,第2页。

③《太平乐府》或因其篇幅较大、刊行较多,后来流传较广,声名显于《乐府群玉》。《太平乐府》元刻本、抄本、明刊本等,流传较多,得诸藏书名家如黄虞稷、黄丕烈、瞿镛、张元济、傅增湘等珍藏、著录、题跋;黄丕烈、吴梅、卢前等又有校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二百《集部》五十三《词曲类存目》亦著录,后《四部丛刊初编》集部收录。其影响甚广。而《乐府群玉》明清以来著录、提及者甚少,仅范氏天一阁旧藏孤本,1914年散出,后乃有罗氏心井盒抄本(1915)、任讷校本(1923年校,1931年收入《散曲丛刊》)、吴梅校本(1928-1929)、隋树森校订本(1982),始闻于世。

也,且意西湖西子,有秦人无人之感……即以春夏秋冬赋四章,……然后一洗而空之”云云,包含着破除尘俗,欲为清新之作的创作理想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《乐府群玉》单将这有“引”的小令置于全书之首,它就不仅是刘时中的思想,更有着《乐府群玉》编者的编辑思想。杨朝英(1285?-1355?)编辑《阳春白雪》(初成书于皇庆二年[1313]末、三年初;前、后集合刻于致和元年[1328]后,为十卷本;再增订为九卷本;后至少有两次增订,另文考证)则没有这种意图,到编辑《太平乐府》之时,他在卷首选了冯子振〔鹦鹉曲〕(亦名黑漆弩)36段,保留了原作的小序,云:“‘甚’字必须去声字,‘我’必须上声字,音律始谐。不然不可歌。”这与他在书前编有《北腔韵类》明显有相互照应的用意,其安排并非随意,都表现了他重韵律的理念。邓子晋序云:“乐府调声按律,务合音节,盖犹有歌诗之遗意焉。”是编“以燕山卓氏《北腔韵类》冠之,期于朔南同调,声和气和,而为治世安乐之音”,“是编首采海粟所和白仁甫〔黑漆弩〕为之始,盖嘉其字按四声,字字不苟,辞壮而丽,不淫不伤,澹斋删存之意亦知乐府之所本与!”已与杨朝英有许多会心之处,然仅未意识到该曲“小序”作为点睛之笔的意义。杨朝英这种借他人口吻张一己曲论的方法,当借鉴了《乐府群玉》。

(二)《乐府群玉》所选曲家的范围,影响和扩大了《太平乐府》的选录范围。

《乐府群玉》所选及的任昱、乔吉、李致远、周文质、钟嗣成、王仲元等,杨朝英编辑的《阳春白雪》各种版本(包括增订本)均未选及,至编辑《太平乐府》始选到他们的作品。而这些曲家并非于《太平乐府》编辑前不久方创作散曲,如《录鬼簿》谓乔吉“江湖间四十年,欲刊所作,竟无成事者”,可知乔吉在杨朝英对《阳春白雪》数次增订期间早有积极的创作,却不见赏于人(包括杨朝英);至《乐府群玉》第一次大量地收录乔吉的作品,共收137首,直可与张可久抗衡。后《太平乐府》方选入小令47首、套数11篇。由此可见《太平乐府》一选受到了《乐府群玉》所选曲家范围的影响。

(三)《乐府群玉》的编辑形式影响了《太平乐府》。

《乐府群玉》以曲家结构全书,绝大多数小令皆标其具体题目,极少数无题。杨朝英编辑《阳春白雪》,在《太平乐府》未出的三十多年时间里,屡有增订,然诸本曲前仅署曲家名、段数,极少标出题目。至其编辑《太平乐府》,始于曲前大多标出题目,极少无题。杨氏在编辑形式上的这种变化,当受到《乐府群玉》的影响。

(四)《乐府群玉》的版式影响了《太平乐府》。

《乐府群玉》天一阁旧藏蓝格影元抄本当保留了元刊本的大体原貌。郑振铎藏罗氏心井盦抄本、任讷校《散曲丛刊》本均源于天一阁本,亦当去元刊本原貌不远,今见二本版式,前卷卷末题与下卷卷首题并列,置于下卷之前,下卷题不另页起。如卷五前有并列两行,右行题“类聚名贤乐府群玉卷之四”,左行

本刊稿件写作格式(注释部分)

1. 注释请采用脚注形式。

2. 注释序号请依次用圈码①②③等,每页重新编号。

3. 注释内之引用文献系图书单行本的,第一次出现时应注明作者,书名,出版者,出版年,以及引文出现之页码;再次及以后引用时只需注明作者,书名,以及引文出现之页码。如:

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 **,中华书局,1983 年,第 ** 页。

注释内之引用文献系期刊论文的,则写作:

刘浦江:“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”,《中国史研究》2003 年第 2 期,第 ** 页。

4. 引文要核对原文。

题“类聚名贤乐府群玉卷之五”。杨朝英编辑《阳春白雪》每卷卷首、卷末亦皆有类似之题,然下卷卷首题必另页起。十卷本、九卷本等皆如此。至其编辑《太平乐府》,卷一末卷二首间、卷三末卷四首间、卷四末卷五首间,版式皆同《阳春白雪》;然其他卷间,版式则同《乐府群玉》。《太平乐府》版式如此混乱的原因,大概半是不自觉地沿袭了自己原有的版式风格,半是受到《乐府群玉》版式风格的影响。若未有外来的“干扰”,以杨氏几十年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其书本来具备的成熟的版式风格,断不会至于如此。

由以上四个方面,可以把握《太平乐府》产生过程的时代氛围;对于理解《乐府群玉》来说,可以较真切地把握它在当时的影响是如何地深刻,由此可见其价值之一斑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